

多维理论视域下的全面乡村振兴

雷明^{a,b}, 于莎莎^a, 陆铭^b

(北京大学 a.光华管理学院; b.乡村振兴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在解决我国乡村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多维视角进行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总要求,顺应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衡量维度,即高效、绿色、人文、善治和包容五个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活富裕”要求顺应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发展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要求顺应了产业分工与融合理论的发展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要求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有效”要求则顺应了乡村治理理论的发展要求。城镇化理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产业分工与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乡村治理理论,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有助于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乡村振兴; 城镇化; 城乡二元结构; 产业分工与融合; 可持续发展;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22)02-0130-11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在解决我国乡村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首先应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乡村振兴主要涉及城镇化理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产业分工与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乡村治理理论等,本文拟从这五大理论视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剖析不同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总要求,顺应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衡量维度,即高效、绿色、人文、善治和包容五个方面。具体来说,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活富裕”部分顺应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发展要求,“产业兴旺”部分顺应了产业分工与融合理论的发展要求,“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部分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要求,“治理有效”部分则顺

收稿日期: 2021-1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战略构想和实施方略”(19ZDA002); 国家乡村振兴局2021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专题案例总结项目“西部四村案例总结项目”(TC210F06R/15)

作者简介: 雷明(1965—),男,河南上蔡人,新疆财经大学“天池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原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国务院原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爱丁堡大学H.教授(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区域可持续发展;于莎莎(1993—),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参数评价、乡村发展、贫困治理;陆铭(1998—),男,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社区治理。

应了乡村治理理论的发展要求。

一、城镇化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城镇化指的是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原本的乡村型转化为城市型的过程^[1]。我国的城镇化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通过迁移等多种方式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实现性质上的转化；二是城市自身不断地进步与发展，同时将文明扩散到非城市区域。这一城镇化过程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城市大量接受来自农村的人口及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城镇范围内实现集聚发展；乡村等非城市地区更广范围地接受城市意识与文明的扩散与传播^[2]。

（一）传统城镇化理论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特征。朱文明认为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主要分为三大阶段，即工业起步阶段、人民公社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3]。古杰、岳隽、陈小祥则从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两个变量的相对关系入手，将中国城镇化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正常发展阶段、起伏波动阶段、停滞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极速发展阶段^[4]。与之相对应，我国也在不同阶段探索出了独特的发展方式和道路，即小城镇发展方式、大城市发展方式以及多元城镇化发展道路。

“小城镇发展理论”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他强调推动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性^[5]。但到了发展后期，小城镇逐渐失去发展动力，此时大城市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强调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发展特大城市，将区域内高密度的大中型城市与小城镇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应的都市圈。但单一的小城镇化与大城市论均无法满足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于是一些学者提出“多元城镇化”的概念，强调要同步实施农村城镇化与都市圈建设。

传统城镇化理论的确推动了农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村各项生活设施的完善，但逐渐无法顺应新时代乡村的发展要求。总结来看，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一定局限性：其一，城镇化发展缺少精细化设计，粗放型发展使得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其二，城镇化发展问题忽略了环境与生态的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三，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水平依旧较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接下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推进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关注的层面。

（二）新型城镇化理论

为缓解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带来的种种矛盾，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设计。不同于传统的粗放型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是一种采用精细化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质量的城市化模式。苏小庆、王颂吉等人指出，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指标主要有高效、绿色、人文、善治和包容五个层面。高效城镇化强调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发展活力的提升，发挥城镇自身的示范带动作用；绿色城镇化指以解决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为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发展的结合；人文城镇化指改善城镇精神文明素质，打造人文气氛浓厚的生活空间；善治城镇化是要完善城镇的治理结构，实现城镇的有效治理；包容城镇化则是以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强调提升城镇的包容性与承载能力以接纳农村的人口及发展需求^[6]。

以新型城镇化的五项衡量指标为指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改变城镇产业支撑不足的现状，激发城市产业的经济活力并扩大其就业容量。同时小城镇的建设要坚持以产兴业的道路，通过增加产业收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二，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化。第三，注重统筹性发展要求，打造安全、宜居、舒适、和谐的生活空间。第四，提升城市的治理水平，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相关生活设施和治理体制的配套发展。第五，推动城乡的统筹发展，完善县城交通等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县城承载能力，以满足包容性城镇化的指标要求。

(三) 新型城镇化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目前我国农村表现出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这是长期实行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及城市偏向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7]。要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将乡村与农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具体包括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改善乡村居住环境、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养、改革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以及加强乡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等方面。为进一步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正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五个基础指标相适应,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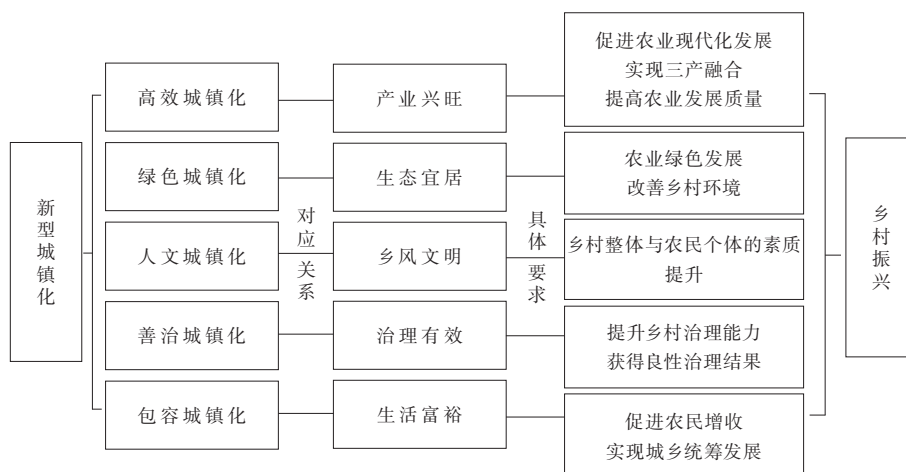


图1 新型城镇化指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对应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发展要求,与新型城镇化理论中的“高效”指标具有一定的吻合性。乡村产业的发展是改善乡村发展面貌的基石,产业繁荣可以为乡村的发展提供全面、持久、系统的动力。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作为首要任务,要求盘活乡村的产业发展要素,同时提升产业的劳动效率,保证产业的发展质量,以此促进乡村产业的振兴。具体有三方面举措:第一,乡村的产业振兴要做到加强农业生产能力,以及提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农业新业态与新模式的蓬勃发展;第二,乡村的产业振兴需要架起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要素流通平台,使城镇的人才、资金与信息能够畅通地流向乡村领域,同时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广范围与更深层次的融合,增加农民增收的途径;第三,要推动农业生产质量的稳步提升,使乡村的农作物产品及其复合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此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宜居”要求体现了新型城镇化理论框架中的“绿色”城镇化指标。新型城镇化理论强调保护生态资源以及适应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性,主张以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为乡村提供更加充足的发展空间,同时为村民提供更加完善的生活环境。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生态宜居”的要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实现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第二,实现乡村生活舒适性与宜居性的提升。从绿色城镇化的角度出发,乡村生态宜居体现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逐步改善,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水平的提升,二者的共同推进能够最终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风文明”要求与生态宜居紧密联系,顺应了新型城镇化理论中“人文”城镇化的发展指标。从新型城镇化理论视域出发,乡村的人文建设可以推动当地居民劳动素养、文化素养以及文明素质的提升,以“懂技术、爱劳动、有文化”为标准建设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队伍,进而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理论中的“乡风文明”要求十分明确:第一,乡村整体拥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和风气,营造良好的人文乡村环境;第二,使农民个体的品德状态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涌现出一批新的乡村建设人才。从人文城镇化的要求来看,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就是要实现乡村良好氛围的建设,以此实现乡村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要求与新型城镇化理论中的“善治”指标体现出共同的效益性与进步性。新型城镇化理论点明了实现城乡善治的重要性，城乡社会的统筹治理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与机会，而城乡的善治能够为乡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要求的提出也体现了这种善治精神：第一，乡村治理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第二，决策质量和水平的提升；第三，决策的贯彻落实；第四，良性的治理结果，通过乡村振兴中其他几项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检验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实现以上四个方面的要求，就能达到乡村的有效治理，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善治”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活富裕”要求体现了新型城镇化理论中的“包容”城镇化指标。新型城镇化强调实现城镇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性，要求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其关键着力点在于完善乡村基础生活设施、交通设施以及文化娱乐设施，同时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供给质量。乡村振兴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生活富裕”发展要求，从而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保障医疗、交通、教育、信息以及卫生等各生活基本要素的供给。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满足农民生活的切实需要，为进一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提供要素保障。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理论的五项衡量指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方面总要求也契合了新型城镇化理论的要求，有利于城镇化的稳步发展与质量提升，为我国乡村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努力方向。

二、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与特征

城乡二元结构，主要体现为其二元分裂性，即城乡在生产及生活等层面体现出一种不均衡、不对称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两区域差距比较明显的经济和社会状态。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双重内容领域，分别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际上是传统农业和现代产业之间产生的一种二元对立状态，这种二元对立体现在城市以工业化的现代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而农村以农业等传统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各自享受的福利制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包括就业、教育、公共事业投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层面。

根据基础城乡二元结构的含义可以得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明显的双层性，指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是典型的城乡双重二元结构^[8]。受双层性影响，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各方面差距逐渐拉大。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较为明显，而城乡之间的社会服务差距则会进一步阻碍乡村的再生性经济发展，形成“乡村经济落后—服务滞后—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恶性循环。首先，乡村缺乏各种发展平台，尤其是资源流动平台和自我利益表达机制，导致乡村在对外的交流与发展中难以掌握主动权，这种低组织化造成农户行动分散化，无法在面对市场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优势地位，造成农民应得的利益受损。其次，乡村的教育事业持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教育资源上的缺乏导致农民的素质较低，难以适应高技术含量、高质量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就无法获得新型产业带来的高利润，这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破除二元结构的方法与策略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对乡村发展的阻碍性较为明显，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就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任务。厉以宁曾指出：“要想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在农村迅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保障制度。”^[9]实际上这是一种“包容性发展”的振兴理念，强调城乡发展之间的支持性、反哺性、包容性、协调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以工代赈、以城补乡、以先进理念带动发展、以共建共享促进振兴”的发展目标，由此提升城乡发展尤其是乡

村发展过程中的收益性。

具体来说,要想有效化解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以多种形式促进农民的增收,其基础是继续加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以及管理制度,形成新型的、适应农村发展的土地管理体系。第二,加大对乡村的转移性投入和社会性吸纳程度。增加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村的资金和资源支援,同时加大城市对乡村的吸纳程度,使农民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化进程中能够逐步融入城市,从而被城市社会接纳和认可^[10]。这两方面的要求需要国家确保农民能够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稳定且渐增的收入,同时要保证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向农村农民以及农民工群体覆盖,使他们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三)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不仅能够解决农村发展的繁荣稳定问题,实现城乡的融合与协调发展,而且能够使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根本的保护,从而使农民的生产创造性、积极性与效益性得以迸发,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潜力的涌现。乡村振兴战略是旨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的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的战略,其中的“生活富裕”要求的核心在于切实提升村民收益,使乡村居民真正富裕起来。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的相关理论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活富裕”部分内容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具体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拓宽农民收益渠道,通过公司化经营或股份化投入切实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增收是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基础,因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农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只有获得更稳健的收入,才能有积极性投入到更多形式的产业生产当中,从而获得更多形式的收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构建“长效政策机制”的要求,意在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等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根据各地农业资源禀赋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农业现代化模式。第二,要提高农业用地的数量和质量。对此,《规划》明确指出要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第三,要提高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数字农业发展,推广“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从以上三方面增加广大农民群体的经营性收入,使农民能够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性要求。

第二个方面是增加对乡村以及农民的资金投入,即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水平,这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核心着力点。《规划》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针对性策略:一是完善对“三农”领域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加强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配置。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加快农村公路、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方面的建设。开发适应新型农业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为乡村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基础。三是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同时着力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倡导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从以上三方面入手,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在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档升级,这不仅能够满足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乡村生活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实现乡村的进一步发展。

三、产业分工与融合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产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同质性特征的经济活动,传统的产业融合与产业分工都是在产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模式。在此基础上,乡村产业分工主要是指农业的分工,即农业

产业链的持续性延伸与拓展,农业生产在基础性的种植和生产环节之中加入更多的生产主体进行分工经营;而乡村产业融合主要是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不断进行融合的过程。具体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即农民)在统筹利用农村的自然与生态资源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依托,综合发展农产品加工、餐饮、休闲、观光、旅游等产业形态,不断拓展产业链长度与范围,以此获得更多的经营利润^[11]。

(一) 产业分工理论

产业分工本质上是产业链的扩展,延长的产业链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也可以促进原有产业链的不断升级革新,因此不断促进产业分工水平的提高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农业而言,产业分工意味着农业产业链的延长与细化,这可以推动农业相关企业的发展,从而为村民带来更多类型的收入^[12]。

产业分工有很多种类和层级,不同的分工方式可以带来多样性的效用。产业分工可以分为立体纵深化和水平延展化两个层次。以乡村农业生产为例,立体纵深化产业分工主要指的是对乡村第一产业进行的分工,即在生产过程中使经营主体达到多元化与多层级化,每一层级的生产部门专门针对单一工序进行劳动工作,如某个经营主体只专注进行产品运输环节,而不参与其他产业环节的发展,以此提升劳动生产的专业性与效率性。而水平延展化产业分工则是对具体产品类型进行宽泛化分级的过程。例如,种植业农产品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大类产品,而经济作物则可进一步分为油料作物、棉花作物、茶叶、烟叶、药材等多种类型,每个经营主体只进行其中一个作物种类的生产,而不涉及其他。

产业分工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它可以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规模效益的形成带来更多的收入,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产业分工的经营模式逐渐难以适应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由此新型产业分工理论应运而生。新型产业分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进行跨区域间的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分离化的产业链协作模式。这种分工方式通过结合不同地区的生产优势,能够为经营者带来更加直观的收益。以农业生产分工为例,整个生产过程被分为若干工序环节的集合,农户可以选择将部分生产环节进行外包,实现经济效率的最优化^[13]。

(二) 产业融合理论

虽然产业分工拥有很明显的优势效应,但农业生产规模小且分散的产业特性导致农业分工深化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为促进产业增收,不仅要进行产业分工,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产业融合。不断创新生产技术,同时适当放松相关产业的管制与约束就成为促进产业融合的核心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上要对市场需求有清晰的认知,不断创新经营主体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从而推动产业的进一步融合^[14]。

根据产业融合产生结果的差异程度进行划分,产业融合可以分为纵向、横向和立体融合三种类型。乡村的纵向产业融合主要指农业经营者由单一的农产品种植与养殖的生产链,延伸至产品加工直到销售的后续产业链。具体指以农业的生产环节为源头,将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关环节融入其中。乡村的横向产业融合是指通过拓展农业的其他功能,发展出新型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培育出具有当地特色的休闲农业和旅游品牌,以此增加农业的附加产值。乡村的立体产业融合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可以提升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的科学技术性与专业性。例如,加强与电商平台或直播网络的合作,展现农业产品的独特性,推动特色农产品基地的发展,从而倒逼农业生产经营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发展^[15]。

乡村的产业融合可以给农业、农村以及农民创造出更多层次的收入渠道,通过农业功能的扩展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农民通过多种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获得更细化的产业链收入,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因此,在产业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合理运用产业融合的相关作用机制,以此推动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

(三) 产业分工、产业融合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方面的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前提,也是解决我国乡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关键。产业的兴旺发展最明显的优势就体现为其对新动能的激发作用,促进特色农产品、信息资本、科学技术等层面的扩大化流通,在资源合理流通配置的基础上带动收入的增加,从而为其他四方面振兴奠定坚实的物质与资源基础。目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低及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度不高的问题,这些难题都成为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化解此障碍的核心在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离不开产业分工与产业融合发挥的重要作用。

乡村的产业融合具体来说就是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交叉融合,即在多层次产业发展之间进行资源的重组与配置,从而延伸出新的发展业态,这是更加贴合乡村实际发展状况的产业融合方式,能够使农民与本地产业有机结合,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更多农业领域的创业机会,使新业态与新产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正因农村三产融合有着突出的优势性,构建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规划》也将农村产业的分工与融合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并突出强调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地位。第一,要发掘农业的新功能与新价值。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开展农产品生产加工、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推动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和主食加工的协调发展,实现农产品多层次、多环节转化增值。第二,要培育农村的新产业与新业态。加强农商互联,密切产销衔接,发展农超、农社、农企、农校等产销对接的新型流通业态。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发展乡村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这种产业链之间的分工、延长与衔接是产业分工与产业融合的共同作用。第三,要打造农村发展的新载体与新模式。促进农业内部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新型业态等多模式融合发展。第四,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持,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水平,为农业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能。这是实现产业融合的动力所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些重点做法体现了产业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中的核心思想,即通过产业链的分化、延长与融合,农业功能的拓展,以及科技的研发与进步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助力。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三产融合也为农村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还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努力:第一,要不断促进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深化乡村体制改革。第二,要优化乡村的行政管理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为多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实践提供相应的环境与政策支持。第三,要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稳定农业的地位,在农业发展拥有一定竞争力的基础上,再推行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避免出现发展其他产业而挤压农业发展空间与资金的问题,让农民真正实现增收。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可持续发展是指以资源、环境、生态与人口为要素基础,以制度创新为政治保障,以科技进步为技术支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内容,达到现代与后代的全体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发展的道路模式^[16]。这一发展过程强调了代际、国家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公平性,也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了硬性要求。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基于我国国情作出的选择,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将自然、经济与社会融合为一个体系,使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共存的关系。通俗来说,这种系统性从环境安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观念更新以及文明发展等多个目标出发,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试图达到多个体系之间的协调^[17]。

根据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涵盖四大主题:(1)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环境与发展的平衡关系。这需要我们改变传统产业结构,采用绿色、节约、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进行产业经营。同时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2)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关注科技创新为经济带来的红利。逐步形成以创新科技、信息资本、高端人才为核心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方式。(3)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大力提升人口素质。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才发展队伍,实现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保留三方面都趋于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率。(4)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关系,既要保持效率的提升,也要保持社会的和谐与公平,从而实现发展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均衡与统筹协调,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造坚实的基础条件。

(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可持续发展包含多方面内容,除基础的经济发展外,基层治理、生态环境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建设也应得到重视,以乡村资源的合理流动使用、经济与环境统筹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文明传统的不断延续为目标,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代际公平发展的要求^[18]。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乡村发展模式,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是不断推动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促进乡村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着力点。要求农村发展要以尊重自然为初始态度,以顺应自然为核心条件,以保护自然为切实任务的环境保护体系。其中最基础的要求就是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以满足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实现农村生产与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秉持绿色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业绿色科技水平,以科技发展带动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三是重视农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和道德素养,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加强农村人口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养高素质、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四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这些要求也为我国接下来的乡村发展提供了努力方向。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主要在于应对当前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在当前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对气候环境的保护,从而为满足日后更多需求作出合理安排,最终实现不同时期的和谐发展。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也十分重要,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的乡村建设,必须既保留“金山银山”,也保护“绿水青山”,建立“以绿水青山带动金山银山形成”的农村发展模式。为实现这一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生态宜居”的总要求,为乡村的进一步建设指明了方向。《规划》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对此,《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构建宜居乡村等多方面举措。第一,要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综合防治,以此实现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要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以此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满足乡村生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此外,乡村振兴战略也强调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性,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加快推进入户道路建设、建立健全整治长效机制等多方面具体措施,以期实现宜居型乡村的建设。

在实际的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推进乡村环境建设与污染治理,以及可持续性生态农业的发展,可以使乡村发展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提升环境与生态效益。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需要实现生态以及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实现农民以及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风文明”部分正好顺应了以上要求,强调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新农村的塑造。具体措施包括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保护利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力图通过多方面的教育和扶持机制来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真正实现乡村生态及文化层次的可持续发展。

五、乡村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乡村作为诸多需求不同的个体汇聚而成的社会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现实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维持乡村稳定和谐状态的过程也就是“治理”的过程。徐勇指出,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解决乡村面临的各项矛盾问题,以此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19]。贺雪峰则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其管理对象是中国的乡村。同时乡村治理也指乡村的自主管理过程^[20]。党国英则认为乡村治理是以政府为基础主体,由政府在内的国家机构为乡村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活动过程^[21]。总结来看,乡村治理指的是对那些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机构进行权力划分的过程,包括机构内的横向与纵向治理关系,也包括村民自治、乡村建设等多个层面,以期最终实现乡村的有序发展。

(一) 乡村治理理论

中国的乡村治理理论拥有明显的国家特性,包括乡村治理的主体、过程、权力配置与发展目标等多方面。第一,乡村治理的主体并非单一化设定,而是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村党支部、村团支部、村民委员会等村级组织,以及慈善基金会等民间团体与组织等。第二,乡村治理的主动性与自主性比较突出,各层级掌握问题处理的主动权,从而推动治理效率的提高。第三,乡村治理的目标体现当下乡村发展的紧迫性,即实现乡村公共利益的最优化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家层面的进步^[22]。因此,所有有利于村民利益最大化以及增加村民福祉的行动都可以纳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保证多元主体行为的有效性,释放乡村治理主体的潜力,前提在于提高乡镇政府以及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为村民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管理与乡村建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23]。同时,村民的主动参与和乡贤能力的发挥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关键,可以激发村民参与事务管理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其主人翁作用。除了相关基础性条件的建设,乡村农民主体的思想建设也十分重要。因此,应着力强化乡村治理主体的发展观念,这也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思想支撑。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采用“一核多元”模式以及“三治结合”治理模式。“一核多元”模式主要是将乡村治理主体进行智能划分:中国共产党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是乡村治理的指导力量,村民委员会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其他乡村经济社会组织为乡村治理提供动力。在党的领导下,各治理主体有其各自的义务。多元主体之间可以创造出平等对话的可能,减少治理主体在职责上的冲突与矛盾,便于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乡村治理的“三治结合”模式依旧保持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在此基础上强调对乡村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其中,乡村自治是一种广范围的群众自治,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经之路,为乡村振兴夯实了治理基础;乡村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石,是保障乡村稳定治理秩序的基础前提;乡村德治指的是通过道德约束来实现乡村善治,是一种运用道德与文化软手段进行引导与治理的方式,立志于对乡风和民风进行道德化重塑,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氛围^[24]。

(二) 乡村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到现在,乡村的发展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的发展面貌也焕然一新,但目前的乡村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矛盾与问题:一方面,我国

乡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滞后性比较明显,一些不合理决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自治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权责不分的问题,导致部门与部门、政府与村民之间出现管理矛盾。科学有效、统筹多方的治理方式是推动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要求,就是要提升乡村的社会治理水平,化解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营造良好的乡村生活氛围。为此,需要发挥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作用,将法治与德治相融合,在此基础上加强乡贤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此达到乡村的有效治理。

在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下,包括基层治理主体、社会组织、村民个体在内的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并保证参与的平等性。其中,基层治理主体为核心,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而其他各类主体按照责任要求共享资源与公共权利,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工作,从而实现乡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强调的是,乡村村民的“主人翁”地位不容忽视,村民自身积极配合并且发挥主动性作用,是乡村实现自治的基础条件。在实现乡村自治的基础上,效益化的乡村治理模式还强调对乡村法治以及德治的建设。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法治能够高效地解决村内大部分现实问题,而德治是法治的一种补充,能够通过温和的手段对村民进行约束。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增强村民法治观念来强化乡村法治工作,同时加大德治教育宣传力度,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来夯实乡村德治基础。

在不断推进法治与德治建设的同时,鼓励社会人才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规划》指出,要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引导和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人才支撑计划的重要性,以此通过乡村自治、法治以及德治的综合治理来实现治理目标的公共利益最大化^[25]。

如前文所述,乡村治理的核心着力点在于发挥基层政府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领导与引导作用,这是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核”所在。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也着重强调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包括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责任与保障等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层次、立体性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使“党委领导”这个核心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同时,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法治意识、自治意识也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建设平安乡村等具体措施,达到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的乡村治理境界。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部分的一些具体措施能够满足乡村治理的实际要求,为新时代乡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2]赵伟.城市经济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3]朱文明.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发展模式[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3(2):17-20.
- [4]古杰,岳隽,陈小祥.新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及政策分析[J].规划师,2015(10):74-81.
-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6]苏小庆,王颂吉,白永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现实背景、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0(3):96-102.
- [7]沈忻昕.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存在的问题[J].农业经济,2020(6):29-32.
- [8]王勇.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成因探析[J].社科纵横,2012(4):42-44.
- [9]厉以宁.走向城乡一体化:建国60年城乡体制的变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09(6): 5-19.

[10]李学.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制度分析与对策反思[J].公共管理学报, 2006(4): 87-93, 111-112.

[11]苏毅清, 游玉婷, 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 2016(8): 17-28.

[12]苟兴朝, 范云峰.产权细分、分工深化、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四川崇州实践的考察[J].开发研究, 2020(2): 88-94.

[13]金福子, 苏燕华.现代农业发展中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研究[J].农业经济, 2019(9): 19-21.

[14]孔祥利, 夏金梅.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关联及协同路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10-18.

[15]许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理论分析、实践探索及对策建议[J].开发研究, 2020(4): 110-117.

[16]冯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思想渊源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4): 50-55.

[17]牛文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3): 280-289.

[18]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三元素[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4(4): 410-415.

[19]徐勇.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创新[J].中国农村经济, 2016(10): 23-26.

[20]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 2005(1): 219-224.

[21]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 2008(12): 1-17.

[22]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 学理性案例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4(4): 24-31.

[23]王海侠, 孟庆国.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 “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J].探索, 2016(1): 127-133.

[24]苏敬媛.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理论的提出、内涵及模式[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0(9): 73-76.

[25]黄涛, 秦密密.合作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运用研究——以郝堂村模式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26-33.

责任编辑: 吴晓霞